

文化生产视域下谍战片革命修辞的逐渐隐形

杨雁超

赣南师范大学，江西 赣州 341000

DOI:10.61369/EDTR.2025100031

摘要：谍战片作为观众喜爱的影视题材，本身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它取材于中国真实的革命历史，是中国人对于独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它的崛起与中国剧烈的社会变动有关，它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中国文化生产机制背后的经济、政治的多重因素。从第一部“反特片”诞生至今，七十多年间，随着文化生产方式变化，中国的谍战片中所体现的政治感开始逐渐消解，革命话语修辞逐步隐形，与此同时，大量娱乐因素和文化动因强力嵌入。

关键词：文化生产；谍战片；叙事；意识形态

The gradual invisibility of revolutionary rhetoric in spy fil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Yang Yanchao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Abstract : As a popular film and television theme among audiences, spy movies themselves have certain peculiarities. It is based on the real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China, reflecting on the uniqu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ts rise is related to the drastic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reflect the multipl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behind China's cultural production mechanism. Since the birth of the first "anti spy film" over the past 70 years, with changes in 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the political sense reflected in Chinese spy films has gradually dissipated, and revolutionary rhetoric has gradually become invisible. At the same time, a large number of entertainment factors and cultural motivations have been strongly embedded.

Keywords : cultural production; spy war films; narrative; ideology

谍战片的缘起可追溯到“十七年”电影中的反特片，自诞生以来，便广受欢迎。它诞生于特殊的文化语境，其创作紧密结合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有着鲜明的政治指向与厚重的社会关怀。从1949年第一部反特片到如今荧幕的“谍影重重”，谍战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服务于不同的政治话语，通过不同的叙事与修辞，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这与中国经济基础、政治体制作用下的文化生产紧密相关。探究谍战片变与文化生产方式的联系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代的谍战片乃至所有影视作品，都在逐渐“去政治化”，表现出强烈的多元化、生活化和人本主义。谍战片的嬗变，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转型历程高度吻合，其美学形态与叙事策略的发展变化，可视作解读现代化进程中权力关系、社会心理与文化政治的重要文本。

一、文化事业国有化，一心一意讲革命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处于国家主导的高度一体化文化体制之下的中国影视领域，内容生产严格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模式体现为：国家通过政权力量，将文化教育领域的一些核心机构（如学校、媒体、文艺组织及科研单位）全面收归国有。与之相应，文化工作者被纳入统一的“单位”管理体制，实现了身份与资源的国家化整合，从而奠定了这一时期文化生产高度政治化的组织基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电影虽具备文化生产的实质，却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意识，反而长期被定义为一项“文化事业”，由国家统筹管理的。此阶段的中国影

视创作与传播，“计划型”模式尤为突出，首要服务于政党的宣传与意识形态建设需求。^[1-3]

反特片的诞生正值此时，建国初期战争遗留问题众多，彼时的中国，在国际环境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立境遇，这一困境让国内政治态势更加紧张，进而使自新中国成立初期便确立的阶级斗争叙事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呈现扩大化趋势。此种境况是外部压力与内部政治逻辑之间的复杂互动的结果，综合塑造了该阶段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中国影视也在努力发挥其重要的宣传功能，于是荧幕上涌现了许多深受观众欢迎和喜爱的反特片，自其发轫之初便被赋予高度明确的历史使命和政治功能。它以革命叙事为载体，系统地传递特定历史的意识形态主张。以《羊城暗哨》《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经典影片为例，聚焦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通过塑造信仰坚定、英勇无畏的英雄人物，构建了具有高度政治、教育意义的叙事文本。这类反特片在主题表达上具有强烈的纯粹性，其革命叙事结构建立在鲜明的敌我对立框架之上，紧紧围绕“肃清敌特、捍卫革命成果”这一核心矛盾展开，叙事进程中几乎不出现与主导意识形态无关的异质元素，从而形成了高度统一、导向明确的话语体系。对革命叙事的突出，也就避免不了对组织和集体的强化，无论是《羊城暗哨》还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革命任务的完成，一定是有群众的帮助和支持，组织的权威性在该时期的反特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具有一套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书写模式。

但是，这一时期的影片没有明显的戏剧冲突，敌我矛盾并非源于人物性格或复杂情境，而是直接源自意识形态结构的二元对立。换言之，矛盾并非通过情节推进逐步呈现，而是作为先验的政治立场被植入其中，成为叙事展开的结构性常量。因此，该时期的影片剧情设置和叙事技巧方面较为平庸，一方面是因为反特片时期的中国电影还不成熟，另一方面影片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现电影艺术的戏剧性，而是宣扬政治思想，达到宣教目的。尤其在好莱坞间谍片剧情套路与性和暴力大行其道之时，建国初期的反特片努力走出了一条纯粹革命叙事之路，弱化情感与戏剧化，展现出与西方“间谍片”模式的显著分野：摒弃了以感官刺激为主的通俗表达，转而将意识形态教化下的阶级斗争作为核心叙事。例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开篇，主人公李侠与何兰芬假扮夫妻，孤男寡女共居一室，铁定的爱情设置，却没有爱情戏，上一个镜头是夏日阁楼闷热，兰芬给李侠扇风，下一场戏便是“组织上批准你们结婚了”，完全跳过了爱情戏份，专注讲述革命故事，展现出建国初期的党领导下的电影文化纯粹的叙事主张，也凸显了该时期反特片崇高的革命信仰。^[4]

二、管理与市场两手抓，革命与情感并肩行

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关系开启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管理模式的虽还有影响，但已显著式微。这一巨变的核心表现为社会重心的根本性转移：从以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与发展为中心。而且，伴随市场化改革与法治建设的推进，一个新的社会领域开始孕育，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极大解放，个人自由空间持续拓展。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入宪法，以及其后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都标志着个体权利话语在官方意识形态中获得正式确认，这共同构成了后总体主义时期国家—社会关系重构的关键维度。

这是一个巨大进步，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进程中，随着由农村向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拓展，宣传文化领域的转型也同步启动。改革路径呈现出多层次的制度创新：首先，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八家中央级报纸率先提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运作模式，很快在主流媒体中广泛推行了这种“事业化属性、企业化经营”的双轨机制；其次，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市场化管理方式，文化机构内部激励竞争如火如荼，组织

活力被有效激活；最后，文化市场的合法地位在国家层面逐步确立，并通过政策引导积极培育市场体系，最终形成以制度保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百花齐放的格局。

此时，中国影视领域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开始逐渐呈现出丰富的自主性特征。其定位从过去较为单一的意识形态载体，转向兼顾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表达的复合型文化形态，在市场运作、艺术形式和创作主题等方面都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这一转变既反映了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调整，也体现了影视行业在政策范围内寻求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平衡的运作轨迹。这一时期的谍战片也相应有了改变和突破，从上一阶段纯粹的政治意识形态表达，转向对个体在历史境遇下对主体性精神建构的深度关怀，审美转型呈现出叙事重心由宏观集体话语向微观个体经验位移的倾向。内容上也用生活化的叙事来代替单纯的革命叙事，通过情感发展的呈现与日常生活经历的书写，让剧中人物拥有丰富的私人生活空间，从而实现革命话语与个体生命的穿插建构。该时期的叙事主体完成了从集体政治主体向个体化行动者的转移，叙事焦点由对组织共同体力量的凸显，转向对具有自主意志与情感丰富的个人英雄的审美化颂扬。

虽然影片内容仍然围绕紧张的革命斗争展开，但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丰富的生活实践和个人情感元素，这些元素的存在使得影片人物形象更加可爱、丰满，也使得故事变得生活化且可信度高，观众也会被这些生活化的情节吸引，引发对英雄的共鸣和共情，从而潜移默化完成主题表达，进一步凸显了人物角色所承载的信仰和奉献精神的崇高性与感染力。但这些生活元素的引入并未动摇其核心政治叙事结构，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传递的审美修辞策略，这些情感叙事被结构性嵌入既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旨在为政治话语进行价值增值，其运作始终服务于核心意义的符号再生产体系。尤其在谍战剧早期发展阶段，其对情感维度的处理呈现出高度的审慎性约束，类似于拥抱、亲吻的亲密身体表征被极度克制，情感表达也常常停留于象征暗示的层面。这时的情感要素尚未构成独立的叙事轴线，而是作为旁枝末节的附属符号，被策略性地嵌入以政治斗争为主干的情节结构之中，承担有限的点缀功能。

三、市场主导产业路，革命修辞渐隐形

从中共十六大开始，中国政治生态呈现公民政治参与持续扩大的趋势，公民政治权利意识日益觉醒，政治参与诉求显著提升。与此同步的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治理范式，正从意识形态统摄下的单向传播模式，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模式。其运行逻辑中“统治”色彩渐趋隐形，“服务”和“管理”功能持续增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影视创作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路径：在坚持主流价值观引导的同时，一大批日常生活叙事、聚焦社会现实、关注个体生存、秉持人文关怀的影视创作涌入大众视野，逐渐形成了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创作潮流。尤其新媒体的出现，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使得文化消费更加个性化、多样化和微观化，市场成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弹幕与二次创作让

受众在文艺创作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这一时期谍战片也迎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它们的特点是革命叙事的痕迹淡化，开始为生活和情感让位。

在市场经济背景深化与社会文化多元的语境下，谍战片的内容生产已突破以革命斗争为单一轴线的表述框架，而是嵌入个体情感维度与家庭伦理冲突，对原有的革命宏大叙事进行重构与稀释。主人公不仅仅是国家的战士，更是家庭中的“父亲”“丈夫”“儿子”。2009年播出的电视剧《潜伏》，作为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主旋律作品，实现了市场反响与艺术评价的高度统一，至今都是一部兼具文化政治意义与大众接受度的现象级影视文本。它在题材上延续了之前的敌我斗争，还继承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假夫妻的配置，但创作风格上进行了形式大胆的创新和改造，通过家庭伦理叙事与职场权力关系的有机嫁接，构建了多元复合的叙事结构。在主题表达上实现了从单一斗争向多维人性的书写转移：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内在情感世界不再作为附属品，而是上升为与主线任务并行的核心叙事驱动力，情感叙事已发展为一条具有自主结构功能的线索，不仅贯穿叙事进程始终，更是深度参与情节构架与矛盾推进的关键驱动要素。^[5]

在电视剧《潜伏》所构建的叙事场域中，主人公余则成的斗争呈现为一种高度智性化与非暴力对抗的形态，既要完成传递情

报的秘密使命，又必须在敌人阵营中维持伪装的身份。还有一条重要的感情线，即余则成与三个女人的情感发展脉络，与斗争线相辅相成贯穿全剧，相互交叉。从这部剧可以窥见，谍战剧的感情部分已经可以上升到几乎与阶级斗争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以大方直接的表达代替了前期的含蓄委婉，“政治性”和“娱乐性”双线并行得以实现。但是市场主导文化生产很容易导致这种现象过犹不及，也有一些谍战片把情感与生活当做主要元素，而革命叙事退居提供时代背景的角色，甚至以大量的裸露和性爱镜头来博取眼球，通过满足观众的窥探欲来提高收视率。这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文化生产环境中是无法想象、闻所未闻的。^[6]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从谍战叙事的脉络中辨识出其演变痕迹：革命话语体系彻底隐形，意识形态表达趋于含蓄、影像的奇观化明显增强……但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时代虽然更迭，但谍战片的本质却一直保持着内在的稳定，依然是政治表达和娱乐形式的配置协商，变化的只是不同的内容和审美要求。反过来，影视的“去政治化”“生活化”和“人本主义化”已也成为参与形塑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重要动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可以推断，观看、欣赏和喜爱这类影视作品的国人越多，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朝着该方向发展的步伐也越来越快。

参考文献

- [1]陈强.从当代中国影视作品看中国政治转型[J].电影文学,2011,(20):16-17.
- [2]李琳.中国当代谍战剧叙事策略的变迁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9.
- [3]陈彦均.改革开放后中国谍战电影政治修辞的位移[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8,(03):43-50.
- [4]姚振轩.浅论中国谍战剧的发展与流变[J].传播与版权,2018.
- [5]李城.谈新世纪以来我国谍战剧创作的瓶颈及突破[J].中国电视,2015,(10):76-79.
- [6]刘月悦.论谍战英雄传奇的文体创新[J].中国文学批评,2023,(03):146-153+192.